

收入分配改革如何不“雾里看花”

“收入分配改革是今年两会我最关心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陕西黄河集团公司24车间工段长王卉,看到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专门篇幅谈收入分配改革,觉得看到了提高基础产业工人工资的希望。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的呼声由来已久。新华网两会前的调查显示,收入分配高居最关心的话题榜首。而收入分配改革如何不“雾里看花”,成为两会上备受关注的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计划报告则用了“尽快出台”的表述。与会代表委员和会外专家纷纷就这项改革如何取得实质性突破建言献策。

破除垄断,通过竞争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

由于垄断行业基本属于国有企业,对国企收入分配进行调控,政府拥有足够的手段。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财经大学校长艾洪德建议,继续深化国有垄断行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改革,控制高管年薪、垄断性企业高红利,对垄断行业工资一方面控制总量,另一方面控制人均水平,以调整行业工资差距。

“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垄断与平等竞争的冲突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

长盛松成的评论一针见血。

行业间存在的巨大收入分配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突出表现和主要特征之一,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量垄断行业的存在。“一些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没有转化为公共所得,而成为集团利益,非常不合理。”全国人大代表、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建议,要提倡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特别是改革垄断行业,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更多行业,通过实现行业间的平等竞争来推动收入分配的公平。

垄断行业的问题背后,其实是国有资本应当投向哪些领域的深层次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未来的国有资本要更多投向公益性领域,而不是竞争性领域。

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最易见效

计划报告提出,继续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部分优抚对象待遇水平,落实在义务教育学校、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政策。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通过二次分配方式,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最快、立竿见影的做法。”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赵相平指出。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同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当前推进收入分配改革中应首当其冲,也是最易见效的环节。”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商洛市市委副书记杨冠军说。

事实上,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2009年,国家在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加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了一系列努力:连续六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启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进入2010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各地“停摆”一年多的最低工资标

准调整工作也重新启动。

农民是占我国居民比例最大的一个群体。农民增收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完善是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国家的惠农政策,已经使农民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下一步,希望国家加大对农村产业发展的支持,让农民获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村党支部书记杨丰岐说。

“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弹性最强,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政策倾斜,增加他们的所得并减少其消费的后顾之忧,对内需的扩大作用效应最为明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说。

打造服务型政府,切好国民收入的“蛋糕”

无论是破除垄断,还是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都只是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大蛋糕”中的一部分,根本还是要切好国家、企业和居民的“蛋糕”。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和重点还是政府,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向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迟福林委员强调。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测算表明,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看,1992年至2007年,我国政府部门收入增长了9.36倍,企业部门收入增长了10.36倍,居民收入增长了7.66倍。但这其中的政府收入没有包括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各种非预算收入,政府实际可支配收入要比统计数据更大。

迟福林委员说,现在财政收入一年将近7万亿元,应该说具备了收入分配调整的能力了。但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同等水平国家比,社会支出占比20个至30个百分点,建设投资明显较高,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比例明显偏低。

“民众没有同步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实惠,怎么解决?还是得通过改革的办法,重新切好国民收入的‘蛋糕’。特别是政府要转为服务型政府,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公共服务。”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分析认为。

李东生代表建议,为实现社会公平,政府应当在再分配中起主导作用,努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广泛的基本公共服务,适时调整最低工资。同时,企业要与职工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建立系统性的职工培训机制,激励职工在为企业创造更高价值的同时获得更高的收入回报。

据新华社

2010 中国如何开启新十年

香港《大公报》4日刊出署名评论《十年起点 大国求变》。评论说,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十年者,不足以谋一年。当今年全国两会大幕开启时,其实中国政府很多工作和重要目标都已指向2020年。站在新起点上,中国已没有时间徘徊。从“人的尊严”出发,从“公平正义”出发,从“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从今年两会出发,未来关键十年的变革已箭在弦上。文章摘编如下:



新的起点 新的开始 (资料图片)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十年者,不足以谋一年。当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其实中国政府的很多工作都已经指向了2020年。

中国将很多重要目标设定在2020年,包括在这一年将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医疗将覆盖城乡等。而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要这十年间完成上述任务,任重而道远。这就决定了三月的两会,不只是全面部署今年工作的起点,也是又一个新十年的起点,甚至还是经历了建国六十周年辉煌成就之后,又一个新甲子的起点。

今年两会,“变”字当头。两会前夕,国家主席胡锦涛用了五十二个“加快”督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成为今年两会最核心的关键词之一。《选举法》的修改,有望实现城乡同票同权。如何改变暴力拆迁、重大安全



(资料图片)

事故等累积的社会问题积案局面,如何改变老百姓背房贷、看病难、上学难“新三座大山”的民生困境,也都是会场内外最受关注的话题。

中国经济正从国际金融危机中企稳回升,并已跻身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否会二次探底仍不明朗。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对中国发展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以能源资源的肆意消耗、生态环境的过度透支、巨大劳动力成本的廉价支付为代价换取的经济增长,已经越来越变得脆弱。

更令人关注的是,在财富规模高速增长的同时,对财富的分配和对民生的改善严重滞后,呼唤尽快构建一种柔性的发展方式,让民众分享发展成果。这是今年两会不容辞的第一要务。既立足今年工作,又须避免短视,以未来十年的视角来进行认真的思考。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3日在报告中大篇幅为“转变”和“民生”鼓与呼,也释放出了这方面的信号。

已经实行了六十年的城乡二元体制,今年两会将出现制度层面的松动。《选举法》的修改,有望赋予农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投票权。客观地看,这对于填补巨大的城乡鸿沟而言,显然还远远不够。僵化的户籍壁垒,上亿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城乡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差距,不是一个“同票同权”所能改变。而留给这些问题的时间同样也只有十年,因为如果城镇化进程没有实质进展,要在十年后实现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无疑将很困难。

虑之贵详,行之贵力。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已没有时间徘徊。从“人的尊严”出发,从“公平正义”出发,从“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从今年两会出发,未来关键十年的变革,已箭在弦上。

据中国新闻网



新闻时评

向权力带来的既得利益开刀

有些议题是两会上的“老生常谈”,比如公车改革、官员财产公示、财政预算监督、减少行政支出等等。它们一遍遍地被提及,却又悄无声息地落幕,所以成为“老生常谈”。

今年的两会,媒体评论再度“纠缠”于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不管是两家报纸同时发表的“公车改革不能再拖而不决”的社论,还是“官员率先申报财产是调整收入关键”、“网民倒逼财产公示应有制度性回应”的评论文章,都体现了媒体和社会舆论有不甘、难言放弃的心情。

在谈及公车私有、浪费巨大的原因时,有社论分析:“原因很多,比如一些官员品德低下,寻机损公肥私,占公家的便宜。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各级人大没有管好预算,让一些品德低下的官员得以实现自己的贪婪。因此,公车改革,其实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方案,只要人大真正尽到自己的责任,严格地制定每年的政府预算,公车车数量就可以被控制住,甚至可以减少。”

不妨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人大没有尽责?身陷利益之中,多是根本原因。毋庸讳言,现有人大代表中,官员数量过多,这些官员代表,又大多享有公车,如何让他们向自身利益开刀?

再说预算监督。谁都知道有钱好办事,不受约束地花钱最痛快。一本财政支出的明细账,痛快地交到民众手里,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尽管政府花钱百姓有权知道,可要让纳税人清楚知道税款用于何处,却是千难万难。

这些问题之所以无解,皆因利益掺杂其中,既得利益的难以撼动,使得诸多改革举步维艰。

我们承认多元化的社会,也认可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所以才要通过公平合理的博弈,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共享。但是,作为政府部门、作为官员,却没有权力借助手中的公权力为自身谋利,更不存在“利益分享”。一切权力所带来的利益,都应毫无保留地归还人民。

显然,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改革任重道远。

以官员财产申报为例。这一屡提在两会上被提及的代表议案,之所以迟迟没有下文,与多数官员的反对态度密切相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反感”太“正常”了,所以才会一再拖延着制度的建立,即使少数地方进行的改革尝试,力度也明显有限,远未达到公众的预期。

再一次讨论这一话题时,媒体评论说:“调整收入分配在通过一系列行政改革,首先堵死哪怕部分堵塞少数社会成员尤其是通过官商勾结攫取社会财富的各种渠道、暗箱和环节。若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不再成为‘空心汤圆’,官员财产申报不但是不可取代的前提条件,亦是针对性地补齐其他制度建设短板的先决条件之一。”

问题在于,如果制度建设的投票者,陷身利益的泥潭难以自拔,公众又如何能推动和促进制度的形成?

这似乎是一个两难定律,却必须寻找破解之道。

一项有11370名网友参与的调查显示,近九成公众期待代表委员超越阶层局限,其中74.1%的调查者希望,代表委员是“以国家民族和全体人民利益为重的人”。我们寄望更多的代表委员超越自身利益,从而推动制度的改革;我们更希望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让代表委员以国家为重,为民建言、为民争利。

冯雪梅

让公民监督的阳光照进官员财产申报

各种利益纠葛让体制内的监督出现真空地带,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鉴于此,我建议,在制定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一监督体制的时候,魄力大一点,将群众、媒体的监督作为常态化机制纳入其中,引入第三方审计,体制内的管理和体制外的监督相结合,形成合力,这样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才能国家省心群众满意。

我们知道,对于政府的财政预算及执行,除了审计部门的审计之外,公众也有提出申请公开的权利,广州财政局在2009年应公民要求将政府财政预算公示到网上曾赢得了满堂彩。而官员财产申报及公示有相通之处,并且在公众监督、民间审计这一块,要比政府财政公开做得更好。官员乃至公务员的收入、住房、投资,以及配偶子女从业等信息纪检部门掌握好,随时等待百姓来申请“查账”。这样的话,不但官员要经得起“查账”,实际上更是把体制内的监督机构纳入到了公众的监督阳光下。

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把反腐倡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而官员财产申报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更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迈出的重要一步,迈好这一步,体制内监督的完善必不可少,但让体制外监督的阳光照进来,同样是关键。

时言平



该怎么理解“先谢国家后谢爹妈”

在你爹妈没问题的情况下,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先说感谢爹妈就完了。——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在政协会议上批评冬奥会冠军周洋。(《新京报》3月8日)于再清的话,引起了舆论的强烈质疑。

周洋的赛后感言很实在,发自肺腑,感谢父母的辛勤养育之恩,没有什么错。不过,于再清委员的话听起来刺耳,其实细想想也没有什么错:感谢爹妈没有问题,但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不能说感谢父母就“完了”。道理很简单,我国体育是举国体制,一个奥运冠军的出炉,背后是国家长期的巨大投入。而正是由于在精英体育上耗费了过多的财力物力,才无形中导致了大众体育投入的匮乏。这倒是说说着,运动员出成绩了,难道不该对国家说声感谢吗?

说起举国体制,长期以来,国内外都不乏有质疑之声。实话实说,在笔者看来,“举国体制”就制度上来说未必“新颖”,也具有一定的弊端,但切入国情,目前举国体制在我国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面竞技体育基础略显薄弱的今天,废除举国体制为时尚早。强行为之,一味模仿西方,必成东施效颦,中国男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还在于,有很多竞技体育项目很难走向市场化,离开了举国体制没法推广发展。像射击,过了奥运会等大型赛事,无论你怎么推广都注定是一个冷门项目。而足球就不一样了,中国男足踢得再臭,却仍然拥有很大的市场。其实,体育举国体制并不是孤立的,其与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体系相联系,单一对体育举国体制进行“剥离”,本身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命题。

“敏感问题”说不得

《广州日报》报道,某人大代表、地方农业部门负责人在应对“您怎么看‘毒奶粉’、‘毒豇豆’等食品安全问题接连出现”的提问时,竟然回答:“你在两会问这个干什么?这个问题这么敏感,你问我干什么?”作为人大代表,到北京去出席“两会”,当然有责任替人民说话。“毒奶粉”、“毒豇豆”等食品安全问题,正是当前百姓十分关心的关系到切身利益的大事情,这位身为地方农业部门负责人的人“人大代表”,居然像耗子躲猫般地害怕记者对他提出这一其实也涉及他自己的工作职责的问题,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吴之如 文/画

机制——以制度化的存在,让国家投资培养出的体育精英们用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和社会。

举个例子说,运动员夺冠后,地区、省、国家会层层给予奖金,再加上林林总总的商业赞助,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少则上百万,多则上千万。无论从何从理,奥运冠军似乎都应该让出一部分利益进行回报——譬如可以以建立某种体育基金的形式,以奥运冠军们的回报弥补大众基础体育投入的不足,或者,对社会公益事业进行“赞助”。但时至今日,却没有听说哪一个奥运冠军捐钱出来反哺国家。

因为只有投入,没有实质性的“收获”,体育举国体制成为一种“金牌工程”和“造神运动”——奥运会之后,谁是最大的赢家?国家?社会?是那些一朝夺冠天下知,赚满了口袋和名气的奥运冠军们。他们很辛苦很努力,有敢于拼搏的精神,但这一切,离开了国家的培养,从何谈起?所以,冠军们应该学会感恩和回报。陈一舟